

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

主 编：罗小凡

副主编：（按姓氏笔画排序）

卢汉桥

张世平

周发源（执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课题核心成员

罗小凡

卢汉桥

黄国秋

周发源

张世平

谭小宝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绪论：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的基本问题	(19)
第一节 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概念的提出	(19)
第二节 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的研究目的、 边界及内容	(29)
第三节 当前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的研究重点	(36)
第四节 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研究的方法	(44)
第二章 劳动力剩余与人口流动的数量的测算	(47)
第一节 劳动力剩余的概念、分类及其测算任务 与原则	(47)
第二节 社会劳动力剩余总量测算	(51)
第三节 城镇失业人员统计	(59)
第四节 企事业单位隐性失业人员测算	(63)
第五节 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测算	(65)
第六节 剩余劳动力素质的测算	(69)
第七节 人口流动规模测算	(75)
第三章 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的方向	(79)
第一节 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	(79)
第二节 农村人口的城镇化	(86)
第三节 城市内部劳动力的流动与转化	(93)
第四节 湖南劳动力与人口的跨区域流动	(99)

第四章 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的模式和渠道	(105)
第一节 劳动力就业的经济学分析	(105)
第二节 劳动力转化和流动的理论模式	(117)
第三节 劳动力转化与流动的渠道体系	(132)
第五章 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149)
第一节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49)
第二节 对充分就业的影响	(154)
第三节 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	(159)
第四节 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166)
第五节 对科技进步的影响	(173)
第六节 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178)
第七节 对劳动力自身的影响	(182)
第六章 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的社会经济根源	(184)
第一节 生产要素配置的不均衡与劳动力转化及人口流动	(184)
第二节 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与劳动力转化及人口流动	(196)
第三节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劳动力转化及人口流动	(212)
第四节 社会经济制度变革与劳动力转化及人口流动	(222)
第七章 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的政策环境	(233)
第一节 劳动政策	(233)
第二节 人事政策	(244)
第三节 户籍政策	(249)
第四节 教育政策	(255)

第五节	计划生育政策.....	(262)
第六节	相关政策体系的有效组合.....	(265)
第八章	加快劳动力转化与合理引导人口流动的战略.....	(274)
第一节	2010年湖南劳动力与人口增长及其社会 经济环境的预测	(274)
第二节	组织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的目标体系.....	(282)
第三节	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的工作重点.....	(294)

序 言

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是两个紧密联系的经济、社会问题。劳动力跨地域的转移必然伴随人口流动乃至人口迁徙；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即为就业。单纯把劳动力转化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把人口流动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分开来研究，虽然能比较详细地分析其各自的规律，但对他们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一面则不容易评估恰当。例如，对“民工潮”，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看，强调其正面效应较多；从人口管理的角度看，则强调其负面效应较多；体现在具体政策上前者侧重于鼓励，后者侧重于限制，有关管理部门因此出台了某些相互冲突的规定，影响合力的形成。为了全面考察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及相关的经济对策和社会对策，本书以劳动力转化为重点，围绕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之联系（侧重以就业为目的的人口流动），运用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把两者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综合研究，同时也对其各自独特的领域进行具体分析，着重探讨共同规律和对策；同时也探讨各自的具体规律与对策。

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近期和远期影响均不容低估：从近期看，劳动者素质及其积极性高不高、劳动力的配置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经济效益的高低；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又是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合理组织劳动力转化是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一个关

键问题；人口的有序流动既是劳动力合理转化的客观要求，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更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完善我国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合理可行的劳动力转化和人口流动机制。目前，改革的深化，特别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使我国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流动的数量迅速增多，流动的渠道愈益多样，既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引发摩擦与冲突。理论与现实都表明：如何合理引导和组织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且也是我们党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战略和政策时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现代化的实质是要将目前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化为一元经济、社会结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的城市化正是二元结构转化为一元结构的最基本的标志。因此，正确引导和组织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对于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实现共产主义也具有深远的意义。正由于这一意义是如此重大，因此，下面我们将做比较全面、概括的阐述。

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统一的有机整体，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则为其中心环节，在现代化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无论从现实的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正确选择工业现代化的道路对于推进国民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进步事业均具有决定意义。毫无疑问，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相当长时期内主要由先进的城市工业部门与相对落后的农业部门构成，属相当典型且具有刚性的二元经济结构。如何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由二元经济结构直接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的理

论基本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而 80 年代以来，农村工业部门与小城镇的同步兴起，却给我们指明了实现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最现实的道路。乡镇企业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农民开始直接进入工业化的进程，开辟了中国工业化全面发展的新局面。这种新兴的农村工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和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优势的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并存的现象，是一种颇具特色的经济结构，有人把它称之为“三元经济结构”^①。90 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进一步证明：推进三元结构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向一元结构转换的最佳选择。与三元经济结构相对应的是人口在城市、城镇、农村的分布：正如农村工业部门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过渡的中介一样，城镇也是实现农村城市化的中介。

一、由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带动二元经济结构向三元经济结构转化是中国现代化必经的历史阶段

三元经济结构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经济现象，而是中国经济合乎规律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创造力的伟大表现；是农村改革向城乡结合、整体推进方向发展的表现。由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的推行，农业生产率较大幅度提高，农业剩余较大幅度增加，农村出现大量公开化的剩余劳动力，对农村劳动力离农的经济、社会限制被逐渐突破，在比较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然向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而在城乡经济和社会体制分割的条件下，兴办乡镇企业便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选择。乡镇企业孕育于农村母体，而其主体又是工业企业，因而它是一个既有别于传统农业部门，又有别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新兴经济部门，我们不妨称之为农村工业部门。它的迅速发展，改

^① 参见李克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 3 期。

造了中国农村经济的产业构成；扭转了第二产业人数的增加严重滞后于工业产值份额上升的趋势；为农村城市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它在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之间建立起了结构化联系，弥补了断裂层，必然造成国民经济流程发生有利于结构转化的变化。总之，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动及其所导致的三元结构的生成与发展，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历史性阶段，只要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向，不断解决结构转换中的各种矛盾，那么，中国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必将成功。

走发展三元经济结构的道路，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经济建设中的体现。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使广大农民在直接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实现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成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创造力，为解决毛泽东在 40 年代提出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一重大课题指明了方向。这种农民通过发展农村工业，学习现代工业，改造传统农业，在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方面同时取得长足进展的效果，在三元经济发展迅速的苏南地区显得更加明显，张家港市以城镇为依托，坚持发展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高科技、大规模的乡镇企业集团，国民生产总值由 1991 年的 32 亿，增加到 1994 年的 152.5 亿，三年翻了两番，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了 90%，集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也超过了 90%，而且农业在劳动力、播种面积递减中保持了总产量递增；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锐减中，实现了绝对额剧增。工农两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间的差距、城乡人民在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都明显缩小。1994 年城市人均年收入 5720 元，农村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 3680 元。由于集体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在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也大大增加，人民的文化、道德素质显著提高，市、镇文明建设的程度与一般现代化城市比起来并不逊色。吴江市扬文头村紧紧抓住发展

农村工业这一关键环节，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个人口仅1300人的行政村，1994年的工业产值4.5亿元，副业产值200.76万元，农业产值143.7万元，拥有总资产2.5亿元，权益资本金1.5亿元，实现了全村共同富裕，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开展了以“五区五化”（粮田保护区、工业开发区、村民别墅区、集市商业区、文化娱乐区和农业机械化、通信程控化、村庄园林化、环境卫生化、生活城市化）为内容的农村现代化建设。目前农田建设已接近现代化农场水平，村办企业已赶上城市大企业水平，村民生活已超过一般城市市民水平。村民们自豪地说，比起城里人来我们并不缺什么。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发展农村工业的实践中，培育了一大批以村党委书记为代表的热心于发展集体经济又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家。外商赞他们的机制比自己还活，城里的老板称他们是精通经济的铁算盘。在扬文头村已经可以看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经由三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的端倪，显示了三元经济结构的强大推动力。

某些西方经济学者往往从自己特有的优越感出发，认定发展中国家都应重复他们发展起来的老路，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对于他们的理论，如果脱离中国实际照抄照搬，那末这种新教条主义，就比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老教条主义更为危险。伯克、刘易斯等人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概念，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描述，有符合实际的一面。但是，他们提出的指导二元经济结构直接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最多也只能说它概括了西方发达国家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功经验，而在那些仿效这一转换方式的发展中国家，至今鲜见成功先例，与“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的预期相反的事例倒是比比皆是。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占优势，但在城市形成了大量的贫民窟和非正规部门，对

工农业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非但未能推进国家现代化,反而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以约托·洛波斯为代表的另一些经济学者已对其正确性提出质疑。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论,其不适用性尤为明显。实现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而要把数量巨大的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转到城市居住和就业,所需成本是中国目前经济能力所无法承担的。勉强为之,只会造成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严重下降和“城市病”的恶性膨胀,破坏经济和社会稳定。然而国内不同类型经济区域的抽样调查均一致表明,人口向县以下城镇转移,劳动力向农村工业部门转移,所需成本还不到向大中城市转移的1/5,而且大部分可以依靠农民自筹和农村工业在滚动式发展中解决。它对于实现农村人口与劳动力的转移效益较佳,风险较小。比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中国所以经济发展较快,社会波动较小,通过三元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与稳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实践充分证明,我国人民创造的经济结构转换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二、城镇是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主阵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轴心

经济结构转换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农村、农民、农业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轴心是乡村,农民的生活基地也是乡村。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有力地冲击了封闭的农村自然经济,强烈要求农村经济运行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由分散转向集中,一大批新老城镇逐渐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轴心,并且随着三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而得到了迅速发展。1994年我国共有县级以上市479个,城镇5.5万个(其中建制镇1.2万个),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30%,分别为1979年的6.3倍和1.7倍,有的镇经济实力已超过一般市。吴江市盛泽镇,1994年国民生产

总值达 114 亿元，（其工农业产值比为 96：4），财政收入达 1.67 亿元，创汇 1 亿多美元。统计和抽样调查都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余年来，我国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远远高于这以前的三十年，已经成为带动农村现代化的龙头，从而也就成为了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性环节。

首先，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是农村工业部门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和依托。工业经济是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需要集中于一定的区域；城市的根本特点就是集中，它包括人口、生产、消费、财产、政治、文化、科技、信息等多方面的集中。这种集中虽然也伴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它能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是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农产业属于外部经济，其中第二产业因为工人需要集中生产，相应地也就要求集中居住；第三产业更是需要达到一定人口规模才能发展。因此，只有城市化才能推进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打破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过低的不合理状况。二是有利于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的规模效益。供水、供电、供热、仓储、交通、通讯、污水处理、文化、教育、娱乐等公共性基础设施的集中建设和共同使用，可以大大节省成本，提高使用效率。三是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效益。各种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汇合在一起，既能使他们得到合理的组织和有效的使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通过加强分工、协作，推进技术发明、应用和推广，提高技术效益；又能使他们通过社会接触，增强竞争心和进取精神，提高自身素质。四是有利于扩大本地市场，提高市场效益。五是有利于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信息效益。六是有利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综合治理，提高社会效益。七是有利于集约使用土地，防治污染，提高生态效益。农村工业本质上属于工业，显然也只有在相对集中的条件下才能优化发展环境。但受现有城市

规模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可能向现有城市集中，因而自然要向原有的或正在形成的以农村贸易为主的集镇集中，而这种集中又促进了集镇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于是一大批小城镇应运而生，并且其规模迅速扩大。90年代我国建制镇比80年代增加了4倍，未建制的乡属集镇增加了5倍，充分显示了农村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对社会变革的强大促进作用。城镇作为农村工业发展的结果和依托，不仅成为了一定区域内农村经济发展的轴心，同时也成为了这一区域内的政治、文化中心。使它具有了四种功能：一是集聚功能。它相对集中了本地区的资金、劳动力、技术、管理、交通等各种生产要素，使资源配置更为有序、合理。二是连接功能。它上连城市，下接农村，成为了加强城乡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三是辐射功能。它在生产、生活方式和人的精神面貌方面，都对周围农村起带动作用。四是领导功能。它们一般是乡镇以上党政机关的所在地，理所当然地是一定地域一切社会活动的指挥中心。城镇的这些功能表明，它对于推进农村经济的现代化乃至消灭城乡本质差别都能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

其次，城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基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城市工业发展速度相当高，但城市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却相当低。而农村由于人口增加和生产率提高，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这种由于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而形成的二元结构的刚性，正是我国经济结构转移的难点；也是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症结。据测算，我国剩余劳动力1989年为1.5亿，1990年为1.97亿，1995年为2.15亿。由于社会成本与预期收益比较的驱动和对城市现代文明的向往，这些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其中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年劳动力）很自然地要到城市寻找出路，从80年代开始涌向城市的农民工逐年激增，1993年已突破1亿人。听任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自发、无序地流向城市，必将使

城市居住条件恶化、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社会秩序混乱、犯罪率上升，直接激化市民与农民的矛盾，而且短期内大批素质较高的青年劳动力集中离开农村，也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然而如果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束缚在农村，更会严重阻碍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这个具有爆炸性的社会问题呢？关键仍在对社会经济结构作整体性改造，打破“城市办工业，农村搞农业”和“市民居城市，农民居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展农村工业，建造小城镇以吸纳大部分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如果说过去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主要靠“进厂”（乡镇企业），那么90年代以后则主要靠“造城”（新建、扩建小城镇）。人口适当向城镇集中，必然伴随生产要素的相应集中，不仅将直接推动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而且将带动第三产业的更大发展，改变目前乡镇企业中第三产业就业职工不及第二产业就业职工的一半的不合理分布，逐步做到第二、三产业就业的人数大体相近，这样不仅能大大增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同时也将进一步改善农村的产业结构，提高农村经济效益。

其三，城镇是农村经济的“增长极”。经济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初期，“极化效应”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所谓“极化”，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使一定地区的人、财、物、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集中流向某一点，使这一点迅速提高经济综合实力，然后发挥其“扩散效应”，带动周围地区。这一点就是这一地区经济的“增长极”。我国农村经济从整体上说，正处于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三元经济结构转移的初期，特别需要这种“增长极”，而城镇以其集中的特点，理应发挥“增长极”的作用。但是我国目前城镇虽已不少，城建水平却普遍偏低，难以充分发挥“增长极”的

作用。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按经常性登记口径，全国劳动力的非农化率为39.8%，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为20.6%；按调整口径，全国城镇化率为32.3%，农村城镇化率为12.4%，非农化与城镇化之比（NV）全国为1.23，农村为1.66。这一比例清楚地显示我国城镇化严重滞后于非农化，大量非农化是在城镇以外分散进行的。非农产业的分散布局，造成劳力、资金、技术、物资、信息诸多生产要素流动无序，配置失当，效益降低。抽样调查表明，独处一隅的企业，一般用地增加40%，能源利用率降低40%，基础设施投资增加20—30%，管理费用增加80%，人力资源增加1—2%，资金利用率下降20%以上。而且，企业分散在农村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又难以摆脱农村小农经济习惯势力的影响，不利于工人和企业素质的提高。总之，非农产业的分散布局极不利于农村工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换，已成为我国农村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明显障碍。只有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广大农村建立更多的“增长极”，才能加强农村经济动力，使农村经济、社会结构转化取得新的进展。

三、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农村劳动力转化与人口流动的策略

三元经济、社会结构作为一种转换性结构，一方面，相对于二元结构而言，能较充分地开发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对接，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工业部门依托的城镇仍然比较分散，比起大中城市，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一般较低，需要进一步集中、扩大。因此，三元结构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所谓“城市化”，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长，并逐步占据绝对优势；二是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并形成联系密切的城镇系统；三是城市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普及,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逐步接近城市居民。这三方面较全面地体现了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一元化。因此,必须把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加快三元结构演化与推动农村劳动力转化和人口流动作为紧密联系的过程,统一探寻对策。

1. 调整农村发展战略

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更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基础。当前农业部门的低速发展甚至停滞和农村工业部门的高速扩张已形成明显反差,成为影响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矛盾。不切实解决这一矛盾,不仅影响农业的发展,而且也将严重影响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在这方面我国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1958—1960年脱离农业发展水平使工业化与城市化超高速发展,3年内非农劳动力年均增长25.7%,城镇人口年均增长9.5%,结果全国粮食总产量,1959年比1958年下降13.6%,1960年又比1959年下降12.6%,以致不得不精简城市职工和人口,使城镇化率由1960年的24.7%下降到1956年的18.0%。这种大起大落延缓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当前我国农村工业正处于方兴未艾阶段,显然不能采取60年代初那种降低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的办法来缓解矛盾,只能把工农业捆在一起抓,以第二产业支持和改造第一产业,加快农业发展,进一步增加农业剩余,使之适应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要求。为了给城镇化和非农化创造条件,一是要推进农业的商品化,城镇作为农产品交易的重要场所,应对促进市场农业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将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分工与专业化,使人口与农业的分离有扎实的物质基础,使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冲破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羁绊,受市场机制调节而得到合理配置,从而保证在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大量转移时,农业自我发展的能力不被削弱。二是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城镇要努力向农业提供现代的设备、技术、人才、信息,促使农业逐步采用先

进的生产手段、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业剩余。三是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城镇要努力为农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并使之逐步集中在城镇进行，实现农业服务专业化和社会化。其四，要为农业依靠自身积累发展创造条件，目前在农村工业部门刚起步的地区，工业仍依靠农业积累支持；而在乡镇企业基础雄厚的地区，工业已反哺农业，这在一定发展阶段都有其必要性，但从长远看，工业和农业都应主要靠自身的积累发展。这里的关键又是提高农业自身积累的能力。为此必须逐步缩小进而消除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增长的后劲。

2. 调整工业布局和机制

农村工业部门兴起虽然受商品经济的有力推动，但由于当时并未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其布局和机制都存在不少与市场机制不协调之处。当前三元结构演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许多矛盾，都只有通过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调整工业布局和机制才能解决。一是要进一步改变农村工业分散、零乱的格局，发展工贸小区。由于城镇化发展滞后，我国农村工业在空间布局上分散、零乱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已经进入城镇的企业，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布点也不尽合理，产、供、销衔接不上，削弱了市场竞争能力。因此，必须与城镇建设紧密结合，建立农村工贸小区，优化企业空间布局和组织结构，促进集约化经营，专业化协作，推动横向联合，增强规模效益。二是要纠正农村工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提高产品竞争能力。由于受资金、技术、信息限制，不少乡镇企业在创办时只得使用旧设备，生产老产品，以致刚投产就被淘汰，或是产品积压，再生产难以为继，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目前多数乡镇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都面临着更新改造的迫切任务。因此，要推动乡镇企业加快企业改